

国文化史知识丛书●主编 任继愈 ●



ZGWHSZS

南洋华侨史话

巫乐华



陈嘉庚先生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

●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●主编 任继愈 ●

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

南洋华侨史话

巫乐华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(津)新登字006号

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

南洋华侨史话

巫乐华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天津市湖北路27号)

深圳市海天出版印务公司印制封面

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制正文



787×960毫米 32开 4印张 3插页 55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

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4000

ISBN 7-5309-1268-2

F·25 定价：2.25元

编 者 献 辞

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，创造了丰富、灿烂的古代文化。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，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，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，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。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，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，它们多衰落了。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，一脉相承，历久而弥新！

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、历史的范畴，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：首先，除了时代差异外，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。它是在连绵几千月中，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（包括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岭南文化、闽台文化等）和各民族文化（包括壮、满、蒙、回、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）长期的、不断的交流、渗透、竞

争和融合的结果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、历史的、多地域、多民族、多层次的立体网络；其次，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，在黄河、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、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。

继承中国文化遗产，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，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，摈弃其封建糟粕。

我们要继承、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，注重道德教化，强调民族凝聚意识，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。

今天，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。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，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。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、增强民族的凝聚力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，民族的希望，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，既是当务之急，又是长远大计。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，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，从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，为建设中华民族

的新文化创造条件。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，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。

我们设计了历史、考古、地理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典章制度、军事、经济、文艺、体育、生活习俗等方面 110 个专题，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、多层次、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。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。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。

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，我们将十分欢迎。

《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》编委会

1991年2月22日 北京

目 录

一 中国人移居南洋	1
1 古代华侨移居南洋	2
2 猪仔华工	7
二 泰国的郑王大帝.....	13
三 两位开发加里曼丹的中国人.....	20
1 “大唐总长”罗芳伯.....	21
2 “新福州港主”黄乃裳.....	25
四 新加坡历史上的华侨“先贤”.....	31
五 “红溪惨案”.....	38
1 华侨与雅加达的早期开发.....	38
2 “红溪惨案”.....	41
六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营建.....	46
1 年轻的华人甲必丹.....	46
2 营建吉隆坡.....	49
七 南洋华侨与橡胶业.....	54
1 华侨与东南亚橡胶业.....	54
2 何麟书与琼安公司.....	56

八	三位大企业家	59
1	“爪哇糖王”黄仲涵	59
2	“万金油大王”胡文虎	61
3	“华侨旗帜”陈嘉庚	63
4	爱国情怀	65
九	杰出的华侨知识分子	70
1	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	70
2	“防疫斗士”伍连德	72
3	“奇才”辜鸿铭	75
4	杰出生理学家林可胜	78
十	菲律宾的中国将军	81
十一	投资祖国的华侨企业家	89
1	继昌隆缫丝厂	89
2	张振勋“实业兴邦”	90
3	潮汕铁路和漳厦铁路	93
4	携巨资回国投资的黄奕住	94
十二	华侨是革命之母	97
十三	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	102
1	“南侨总会”	102
2	回国参战	105
3	“三年零八个月”	109
十四	历史的新页	114

一 中国人移居南洋

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，从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，从欧洲平原到美国的内陆腹地，都可以见到华人的踪影。有一句相当流行的话“海水到处，就有华人”，生动地反映了这个现实。华人的总人数多达二、三千万，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，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，但许多人还能讲华语（中国的普通话）和中国的一些方言，保持着中国的传统习俗，并且有众多的亲朋是中国人。有些华人经济实力雄厚，有的在科学教育领域崭露头角。他们的成就，他们的传统美德，博得了世人的赞美。他们的今天，已广为人们所熟知；相对来说，他们的过去，人们就不都那么清楚了。各国华人的祖籍国是中国。他们自己，或者是他们的先辈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从中国故土起程，循着不同的路线、以不同的方式，年复一年，历尽艰辛，散布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。他们有相同的辛酸血泪，不同的奋斗历程。有一位华人作家这样写道：

“……感谢我们的祖先，没有他们当年的刻苦耐劳，就没有今日的繁荣美丽。每一块砖瓦，每一根木头，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。”^①

南洋，即东南亚地区。这个地区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，地理条件优越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，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上受两国的影响很深。中国和南洋的友好关系与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。伴随这种联系和交往，中国人就开始踏上南洋的道路，并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。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，就是华侨。不过，“华侨”一词是十九世纪末以后才出现的，在中国古书中，华侨被称作“唐人”、“北人”等等。在历史上，南洋是华侨聚居的地区。这本小书要讲的是南洋华侨的历史和故事。

1 古代华侨移居南洋

中国人是在公元七世纪即唐朝时开始移居南洋的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，对外贸易、航海事业都很发达。这时期就有

① 苗芒：《坚守》第10页，新加坡维华文化服务社，1956.10。

些中国人旅居海外，从事商贸、宗教活动了。唐朝的高僧义净，公元 671 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，去归途中，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宝利佛逝(Sriwijaya)居住，前后共十二、三年。有学者认为，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之一。公元十世纪时，阿拉伯人马素提在《黄金牧地》一书中，记述了公元 943 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，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。南部的巨港(Palembang)中国人最多，他们是在黄巢起义(九世纪末)失败后避居这里的。这说明，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了。此时，华侨的人数虽不多，但由于唐朝强大，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，国际威望很高，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“唐人”，称祖国为“唐山”，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“唐人街”。

华人大批出国，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，是在宋朝。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。公元十世纪，宋朝建立，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，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。宋朝的手工业、商业兴盛，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。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，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。这些，为

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当时华侨下南洋，乘的是风帆，要依靠季候风向，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，只好在当地住下来，待次年再北返。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，为便于商品交易，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，叫做“住蕃”，而且一住就是 10 年、20 年，娶妻生子。显然，这些“住蕃”，就是早期的华侨。据中国史书记载，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、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，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。

元明两朝(1271—1644 年)，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，这样，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。十四世纪时，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。明朝初年，在 1405 年至 1433 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“西洋”的壮举。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舰队，访问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有 14 个是在南洋。郑和的远航，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，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，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，他们开发侨居地，并形成了华侨的“新

村”。在爪哇的麻喏巴歇(Majapahit)帝国有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“新村”，人数相当可观，多的达到一千多户，大部分来自广东、福建南部沿海地区。其他如菲律宾、暹罗、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。据传说，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，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。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、垦殖，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，成了一座纪念郑和(“三宝太监”的城市，叫三宝垄(semarang)。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，人们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，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。这一时期，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民族杂居、通婚，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。

从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，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，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。这一时期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，封建剥削压迫日益加重，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、手工业者纷纷冒险出洋，寻求活路。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，闽粤两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经商而不回来的人也多起来了。明清两朝交替之际，政治动乱，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。这是中国人较

大批出国的原因。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，十六世纪以后，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，到十九世纪末，除暹罗外，整个南洋地区，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。为掠夺东方的财富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。因此，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。这样，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、政治避难者外，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。到鸦片战争前夕，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一百万，分布更为广泛，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。如巴达维亚（今雅加达）、槟榔屿、新加坡、马尼拉等城市，华侨都在万名以上，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在鸦片战争前长达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，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，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的中国南方特色的华侨社会。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。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，破产的农民、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，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。国内发生政治动乱，为躲避战乱、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，

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人，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。

华侨出国达到高潮，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。

2 猪仔华工

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，中国人，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劳动人民，大规模出国谋生，每年平均在十万人以上，累计出国人次超过一千万人，足迹遍及全世界，形成了“海水到处，便有华侨”的格局。

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是：第一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自然经济被破坏，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，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，为寻找生路，不少人只得漂泊异乡。第二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资源，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。特别是十九世纪后期，随着“自由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，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。在殖民主义者眼中，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，而且是“不

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”，有较高的劳动技能，这是矿山开采，园丘种植，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乏的。因此，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。此外，华侨的大规模出国，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清初承袭明朝的“海禁”政策，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，一律禁绝，如有私出，要治杀头之罪。鸦片战争后，随着《北京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清政府被迫废除“海禁”政策，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，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要原因。

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，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南亚。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到南洋去的，但大部分人是通过“契约华工”的方式出国的。

“契约华工”，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，是指华侨“自愿”通过签订契约，应招到外国去做工。其实华工的“契约”是在暴力、诱逼下签订的，几乎和卖身契差不多。也有把“契约华工”叫“苦力”(coolie)的，它源出于印地语。还有一种更普通的叫法是“猪仔”，说明“契约华工”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与牲畜无异。“契约华工”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，但规模

小，影响不大。大规模的“契约华工”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，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才结束。

“契约华工”的买卖(“苦力贸易”、“卖猪仔”)是在“招工”的牌子下进行的。它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：

1.“招工”。南洋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将自己所需的华工人数及条件列出，交到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行，由他们代招。洋行再转由专事人口贩卖的“猪仔馆”去操办。“猪仔馆”付款给人口贩子即“猪仔头”，由他们到各处去“招”人。所谓“招”其实是采取欺骗或掳掠等手段，将壮劳力拉进“猪仔馆”。常见的手段，是用花言巧语诱拐被招募的对象，如说出洋做工可以赚大钱，勾引那些赤贫的人们上钩。为凑足所需人数，在诱拐不成时，不惜采取野蛮的绑架手段，在荒村僻巷、通衢岐路，突然袭击，将人劫走。“猪仔”一进入“猪仔馆”就失去了自由。这种挂着“招工”牌子的“猪仔馆”，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均设有，其中以澳门最多。1855年，清末著名学者容闳曾亲眼看见“猪仔馆”的“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，结成一串，牵往囚室”。这种“奴